

孙九霞, 王钰宁, 庞兆玲. 基于生活实践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构建——西藏夏乌村案例 [J]. 地理科学, 2022, 42(5): 751-760. [Sun Jiuxia, Wang Yuning, Pang Zhaoling. Build the community of life for man and nature based on life practice: A case study of Xiauwu Village in Tibet.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2, 42(5): 751-760.] doi: 10.13249/j.cnki.sgs.2022.05.001

基于生活实践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构建 ——西藏夏乌村案例

孙九霞¹, 王钰宁¹, 庞兆玲²

(1.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2. 宁波大学宁波大学昂热大学联合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 人与自然是地理学的核心话题。以西藏夏乌村为研究案例地, 基于半结构化访谈、参与式观察等质性方法, 从日常生活实践视角, 透视地方社会与自然的关系, 剖析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何以构建。经研究发现: ① 藏族村民与青稞(*Hordeum vulgare* var. *coeleste*)、耕牛互动时, 借助物质、情感、空间以及身份转型等多重生活实践策略与后者联结, 经由人的自然化实践, 建构起表征型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此时, 青稞和耕牛作为工具化的自然, 是村民的身体表征, 在人类行动者缺场或受限时, 扮演为日常生活叙事的角色。② 藏族村民与虫草(*Cordyceps*)、猕猴(*Macaca*)互动时, 借助意义、制度、空间协商等生活实践策略与后者建立联系, 经由自然的人化实践, 建构起链接型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此时, 虫草和猕猴作为对象化的自然, 被社会所建构, 并赋予社会生命, 逐渐嵌入日常生活。

关键词: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人与自然关系; 生活实践; 藏族传统村落

中图分类号: X22; F59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22)05-0751-1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重要论断, 强调“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此后, 国内外众多学者围绕“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科学内涵^[1]、理论逻辑^[2]、历史定位^[3]、实践路径^[4]等内容展开了广泛而深刻地讨论。然而, 既有研究主要聚焦在哲学层面的理念解读与阐释, 相对缺少微观实证研究, 更缺乏来自地理学视角的审视。如何将国家层面的公共政策话语逐步落实到人民群众的具体行动实践上, 有赖于学界走出纯粹的哲学思辨, 走向围绕典型案例的实证剖析。这也就意味着, 如何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成为学界亟待回答的关键问题。

长久以来, 地理学者颇为关注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5]。然而, 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

讨论上, 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一度因截然不同的本体论和方法论而形成相左的观点^[6]。前者本着科学主义的逻辑, 强调自然的物质性及其独立于人类社会系统的内在规律; 后者却过度强调自然的社会价值与意义, 而忽略其客观物质性^[7]。鉴于此, 西方人文地理学者开始从社会建构论视角, 重新反思自然, 逐渐形成全面理解人类社会与自然互动的范式。在社会建构论者看来, 自然不只是客观的物质世界^[8], 也会被社会所建构并赋予象征意义与价值^[9]。因而, 人与自然是差异的、动态的、不确定的, 并且受特定时期、特定社会文化所形塑。基于自然的社会建构理论框架, 人文地理学者围绕“政治与自然、商品化与自然、社会情感与自然、日常生活与自然”^[7]等议题开展了多尺度、丰富且细致的研究。既有研究对本文具有很好的启示意义。

收稿日期: 2021-10-28; **修订日期:** 2022-03-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资助(21AH016)。[Foundation: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Art Project (21AH016).]

作者简介: 孙九霞(1969-), 女, 山东潍坊人, 博士, 教授, 博导, 主要从事旅游人类学、旅游流动与地方认同、乡村振兴与社会空间变迁相关研究。E-mail: sunjx@mail.sysu.edu.cn

通讯作者: 庞兆玲。E-mail: pangzhaoling@nbu.edu.cn

整体而言,社会建构主义视角下的人与自然关系研究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一是,社会如何建构自然。社会对自然的建构受到文化、阶层、权力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故而,自然的社会建构结果是异质的。相关研究发现,同样是家庭庭院中的花园,对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家庭来说却意味着截然不同的意义^[10,11]。二是,自然被社会建构之后,其符号、意义及其物质性所发生的变化。尤其是那些被商品化的自然,不仅会被叠加新的象征符号、赋予新的意义^[12],其生命也将受到人类的规训和管治^[13]。三是,被社会所建构的自然又如何进一步形塑人类社会。有研究发现,游客、旅游移民与宠物狗的互动营造了旅游地的地方意义^[14];被商品化后的虫草(*Cordyceps*)进一步导致藏区内部的发展不平衡^[15]。总的来说,研究者以个体或家庭为分析单位,讨论个体或家庭与某类具体的自然物(某类植物、动物或真菌等)之间的互动。相对较少针对某个特定区域、特定类型的人与自然关系是如何被建构或生产出来的展开剖析。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建立起何种状态类型的关系受人类行动者的行动实践、地方独特的社会文化、非人类行动者的类型等多重因素影响,是个体、地方以及自然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当前有关人与自然互动的研究,较少关注地方的地理文化因素以及自然的属性差异在人与自然关系建构中所起的作用。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一种理想关系类型。这种关系超越了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反映两者之间系统性、整体性、发展性的和谐共生关系状态。该理念肯定人的主体责任^[16],强调以人的实践为基础^[17]。实践成为讨论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关系的中介^[18]。只有通过人类行动者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才能推动“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真正落实。因此,日常生活实践可以成为理解“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如何建构”的理论视角。相较于城市,现代化与工业化程度较低,且自然生态保持良好的乡村将是理想案例地。其中,尤以西藏地区的乡村尤最为典型。尽管西藏地区生态环境脆弱,生存条件恶劣,但藏族人与自然持续互动协商,适应自然、调适自身行为的同时,动态维持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透视藏族乡村中的人与自然关系实践,能够为东部地区乡村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参鉴和启发。基于此,本文试图

从日常生活实践的视角,以典型的藏族乡村——夏乌村为案例,探究“人类行动者如何利用各种生活实践策略,与自然建构起生命共同体关系”。对上述问题的回应将有助于理解“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指导未来实践。

1 案例地与研究方法

1.1 案例地概况

夏乌村位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市江达县同普乡,毗邻317国道,是夏荣村下属的2个自然村之一(图1)。该村平均海拔3300余m,属高原台地,地势呈阶梯状,生态环境良好。根据入户调研,全村共有87户457人,以种植青稞(*Hordeum vulgare* var. *coeleste*)为主,家庭经济收入来源以采挖虫草、货物运输以及少量的当地务工为主,年人均收入约5500元。近年来,夏乌村依托317国道的旅游热度开始启动旅游发展项目。目前村内已建观景平台1座、洒咧营地3处,并于2020年列入全国第二批乡村旅游重点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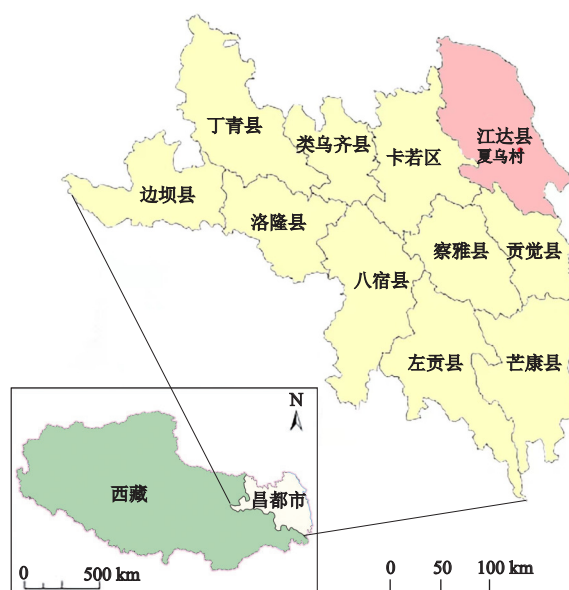


图1 夏乌村地理位置示意

Fig.1 The location of Xiaowu Village in Tibet, China

本研究选择夏乌村作为案例地主要基于2点原因。一是,夏乌村地处青藏高原地区,村民对自然的依存度较高。全村以种植青稞、采挖虫草为主要生计方式,至今仍以牛粪作为主要燃料。二是,全民信仰藏传佛教,拥有节制的自然观。村落

辖区内活跃着熊(*Ursidae*)、狼(*Canis lupus*)、猕猴(*Macaca*)等 10 余种野生动物。村民敬畏自然、尊重生命,与自然始终维持着和谐共生关系。

1.2 研究过程与方法

笔者分别于 2020 年 5 月 16 日至 6 月 3 日、7 月 15 日至 8 月 22 日、9 月 2 日至 9 日、2021 年 8 月 10 日至 9 月 20 日,综合运用观察法、深度访谈法等,在夏乌村开展了为期 108 d 的田野调查。调研期间,研究者先后居住在村委会和桑珠洒咧营地,与驻村干部、营地主人等同吃同住,深入村民日常生活。首次进入田野时,研究团队从村内选任兼通汉藏语言文化的大学生,经培训后,协助研究者入户调研,后续几次邀请 1 名西藏大学硕士研究生担任翻译工作。其中,第一次入户调研 72 户,第二次 43 户,第三次 5 户,第四次 40 户。需要说明的是,在后续的 3 次调研中,除了调研新主题之外,还会针对前几次调研进行查漏补缺,因此,受访农户存在一定交叉。

调研主要面向夏乌村村民以及相关政府工作人员两类群体。围绕村民与青稞、耕牛、虫草、猕猴的互动等展开深入访谈,并实地观察青稞田、雪山、牧场、猕猴保护基地等。访谈时间从 30 min 至 120 min 不等,除记录田野笔记外,同时对访谈内容进行录音,后期及时转录处理。分析文本材料时,主要运用主题分析法对关键信息进行提取。除此之外,研究者留存部分汉语表达能力较好的村民联系方式,建立并加入村民微信群,以便随时补充访谈。入户调研时,每户受访对象不只一人,

受限于篇幅,本文选取在“人与自然关系”话题上提供关键信息的部分受访者予以呈现,并对其编码。其中村民编码为 R,政府工作人员编码为 G(表 1)。此外,收集有关夏乌村历史、藏族文化的相关文献资料作为二手数据予以补充。

2 人的自然化实践:青稞与耕牛表征村民的日常生活

2.1 村民与青稞

2.1.1 物质性策略:食物的制作与种子的选储

食物的简易处理使村民与食材保持最直接的联结。青稞是夏乌村的主要粮食作物,是村民经由劳动实践实现的人与自然间“物质变换”^[4]的产物。村民对青稞的食用方式主要有 2 种:一是,青稞炒熟后,用水磨磨成粉,用以制作糌粑。糌粑是村民一日三餐的主食,也是待客之物。二是,青稞粒脱皮后炒熟,当作日常零食食用。村民用以上最简易的工序处理青稞,制作食物,保留了青稞最原真的口味,由此缔结村民与青稞之间最直接、最天然的联系。

传统种子的储存和坚守使村民与青稞保持最长久的联结。一方面,村民将每年收获的青稞留作自用,粮食保存十分关键。村民依据长期积累的经验知识,认为牛皮袋的防潮功能比木柜、铁柜更佳,并能最大程度地保持青稞口感。因而,尽管牛皮袋价格较贵(约 500 元/个),却备受村民青睐。每个牛皮袋制作十分精致,甚至镶嵌鹿皮以作装饰。村民将装满青稞的牛皮袋整齐地码摆在粮房

表 1 夏乌村受访对象基本信息

Table 1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 respondents of Xiawu Village in Tibet, China

序号	编号	性别	年龄	身份	访谈时间	序号	编号	性别	年龄	身份	访谈时间
1	R1	女	26	教师,翻译	2020-07-24	10	R10	男	20	村民,大学生	2021.08.26
2	R2	女	21	村民,大学生	2020-07-26及 2021-08-22	11	R11	男	53	村民,务农	2021-08-24
3	R3	男	65	村民,务农	2020.07.22	12	R12	男	40	营地老板,前任村长	2021-08-21
4	R4	男	45	村民,务农	2021-09-11	13	R13	男	34	村民,务农	2020-07-30
5	R5	男	50	村民,务农	2020.08.03	14	G1	男	31	市旅发局,公务员	2021-08-13
6	R6	男	66	村民,务农	2020.07.27	15	G2	男	25	村民,驻村专干	2021-08-14
7	R7	男	39	村民,务农	2020-07-25	16	G3	男	42	市旅发局,公务员	2021-08-20
8	R8	女	22	村民,县旅发局公务员	2020-07-24	17	G4	男	45	市旅发局,公务员	2020.08.18
9	R9	男	28	村民,在外务工	2020.08.08	18	G5	女	40	县旅发局,公务员	2021-08-12及 2021-08-18

中,不仅象征着生活的富足与安全,也赋予空间以生活美学。另一方面,尽管夏乌村曾经历过“种子革命”,政府无偿向村民发放精品青稞种——村民将其称为“国家种子”,但在村民看来,传统种子更天然,加工后味道更浓郁,也更能适应恶劣的土壤条件。R5在访谈中提到“一般村内的青稞自留种种在地势较高的土地上,而国家种子会种植在村中偏下位置的土地上,这里的土壤条件较好”。至今仍有半数以上的村民坚持种自留的传统种子。村民用精致而昂贵的牛皮袋储存青稞,并坚持种植传统种子,使村民与青稞之间保持了持久而稳定、绵延不断的联系。

2.1.2 情感性策略:礼物的交换与流动

青稞、青稞制品以及围绕青稞农事所发生的邻里间帮工成为朴素的世俗礼物。首先,青稞及其制品作为礼物勾连起村庄内外的日常生活。夏乌村的部分村民因教育、工作或婚姻等离开家乡,迁往城镇。留守夏乌村的亲人通过复刻熟悉的物品^[19],赠予迁移者,使他们在迁入地保持家的熟悉感。青稞作为与之随迁的家乡特产,链接着迁移者与身后的故乡。R8住在县城的姑妈每次回来都带糌粑回去。附着了情感的青稞成为在地者的有机身体,延续着其与迁移者之间的联结,同时也勾连着跨地方的日常生活。这一点与很多移民为了在迁入地营造根植性的家、实现跨地方适应等所采用的日常策略类似。

其次,围绕青稞种植或收割等农事活动开展的道义性帮工也成为村域中流动的礼物。R9家中有59亩地(约3.93 hm²),每年农耕时都有邻居来帮忙。每到秋收时,由村长出面雇收割机,依次为每户收割,村民间则相互帮忙将青稞装袋运回各自家中。道义性帮工作为礼物在村中流动,消解了村庄内部以家庭为单位的劳动力分配不均衡。与当下多数汉族村庄不同的是,夏乌村没有由“帮工”走向“请/雇工”^[20]。劳动在村内并未货币化,这既避免了对家庭资源先赋性不平衡的强化,也尽可能抹平了家庭间生产力的差异。村民持续种植青稞的同时,相关的农事活动周期性地嵌入日常生活,邻里互助维系了村庄共同体的和谐发展。

青稞种子及其制品作为“人神”沟通的神圣礼物嵌入到日常生活的精神层面。青稞不仅勾连着世俗空间中的家户、城乡,也是“人神”沟通的媒介。村民在藏历新年或藏历五月十五这2 d,精心挑选

青稞种子或糌粑供奉到瓦拉寺中,以祈求神灵庇佑。R10表示“在香炉中焚烧青稞代表对于去世的人的思念。当喇嘛来讲经时会有这样的仪式”。这些神圣的礼物被寄托了对现世农业丰收、家人健康、生活顺利的美好愿望,也承载了对亡故亲人的记忆,表达着对“神灵”馈赠的感恩。作为神圣礼物的青稞链接着过去、现在与未来,以及人、自然与“神”,形成了天、地、人的统一。

2.1.3 空间性策略:栖居空间的环境营造

青稞田环绕藏式民居,天然地美化着村民的居住环境。很多农村,包括夏乌村周边的木巴村、岗托村,村民的生活空间与生计空间相对独立,二者间存在明晰的界限,处于“人地隔离”状态。然而,夏乌村的民居不但未从青稞田中剥离出来,反而散落在青稞田中。这种亲自然的居住模式,营造了浓厚的家园感,提高了村民的环保意识。笔者在实地调研期间发现,每家每户的院落、墙头都种满鲜花,村庄环境整洁美观。村民与青稞田保持着亲密的物理距离,实现了生活空间、生产空间与生态空间的和谐统一。

青稞田不仅为村民营造了诗意的栖居空间,也制造了舒适的邻里距离。一方面,与很多农村地区整齐划一、左邻右舍的标准格局不同,夏乌村的民居呈不规则点状分布,邻里之间间隔一段距离。这一距离某种程度上拓展了家的私密空间,是家空间向公共空间过渡的“中间空间”,或者可称之为“准私密空间”,其保护着家庭隐私,缓解了邻里的“凝视”压力。另一方面,尽管这一“中间空间”起着边界作用,但这种边界感相对温和、柔性。青稞田的排斥性没有高墙或篱笆那么强,而是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因而不会造成村民间的疏离感和冷漠感。可以说,青稞田营造了舒适的邻里交往氛围——既尊重隐私,又不会有强烈的排斥感,起到“形”散“神”聚之功能。

2.2 村民与耕牛

2.2.1 物质性策略:牛粪燃料的使用

耕牛曾是夏乌村村民家中的重要畜力,但如今已逐渐被拖拉机所取代。只有牛粪作为重要的“物”,依然活跃于村民的日常生活。一方面,牛粪等农家肥依然是重要的肥料。春季,村民利用牛粪等堆肥,并于青稞种植前1周进行施肥,用于提升土壤肥力。如今村民已开始使用化肥,仅需在播种前一天完成即可。另一方面,牛粪也是村民

家中的重要燃料。冬季, 村民开始收集、晾晒牛粪, 用以生火或取暖。随着村中耕牛数量减少, 牛粪日渐稀缺, 并开始成为交换物。基于此, 养牛户在村庄社会网络中的位置随之发生变动。R2 提到部分村民开始用草来交换牛粪。耕牛减少带来牛粪的稀缺, 进一步重塑村民的日常生活及社会关系网络。

牛粪不仅弥补了村民能力的有限性与脆弱性, 也继续维系着分类秩序。村民认为牛吃的食物干净, 所产生的排泄物也是干净的。在夏乌村村民的信仰体系中, “不洁不净之物”不能入炉焚烧, 但晒干后的牛粪可以直接入炉, 用于烧饭、煮茶、取暖。R7 说“被人使用过的纸巾就是不干净的, 我们是不能放到炉子里烧的”。村民依据整个生态系统循环的逻辑, 而非“于己是否有用”的现代理性逻辑判断何为“洁净”之物。R1 说“牛不像人, 它们只是吃草啊, 牛粪是很干净的。”因此, 即便日常生活遭遇理性, 也并没有未动摇村民有关“洁净”与“肮脏”的认知。牛粪作为“物”继续在日常生活中发挥功用的同时, 也维系着村民的分类秩序, 保持了意识形态链条的完整性。

2.2.2 空间性策略: 家的人畜共享

村民与耕牛共享民居的建筑空间。从物质形态看, 藏式民居是夯土材质的上下两层结构, 并且拥有面积较大的院落。多数村民将一楼专门用于关养耕牛, 二楼则属于人的生活起居以及礼佛。虽然其他地区的农村也将牛圈养在紧邻居所或居住空间之内, 但相对保持“人牛隔离”。如, 在院墙之外或院内角落搭建独立的牛圈、牛棚等。夏乌村这种“上人下牛”的空间格局不仅是出于对作为财产之牛的保护, 一定程度上也说明村民与牛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物理空间上的接近是村民与耕牛之间心理距离亲近的外在呈现, 进一步塑造了“上人下牛”的建筑空间格局。

村民与耕牛共同使用耕地空间。夏乌村是典型的农耕村落, 耕地的多寡与家庭财富息息相关。村民为了给牛储备充足的过冬草料, 每年选择撂荒部分耕地, 专门用来种植畜草。R3 家中就有两块地用来种草。尤其是经常被猕猴破坏严重的青稞田, 村民专门用来长草。耕地用于种草而不种青稞, 既是为牛储备草料, 也是以一种非对抗的形式化解人与猕猴之间的冲突。此外, 村民允许耕牛季节性地使用青稞田。青稞收获之前, 耕牛“早

出晚归”被放养在后山上, 由一道铁丝网隔离开。直到青稞收割结束, 耕牛的活动范围将不再受限制, 可以在青稞田中寻找食物。

村民将耕牛纳入类家庭成员范围。村民不仅从物理空间上与耕牛亲密联结, 也从情感空间上拉近彼此的关系。首先, 体现在村民为牛“取名字”上。于耕牛而言, 名字不只是一个符号, 也是一张使其进入人类话语体系的“通行证”, 并进一步与主人建立专有联系。村民依据耕牛的外貌特征为其取名, 如身体黑白相间的牛叫“察央玛”(意为黑白相间)、额头黑色的牛为“突查”(意为头上有黑点)等。这一点在人与宠物的互动中十分常见, 但在人与牲畜的关系中并不多见。其次, 体现在村民为耕牛付出的悉心照料和情感投注上。每至 8 月末天气转冷之时, 村民会去后山看望那些被放生的牛, 喂一些盐巴和白酒以增强体魄、抵御寒冬。围绕耕牛的记忆也是村民人生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R4 提到自家一头老牛刚刚去世时很感伤, 之后详细地分享了自家牛从出生到放生的系列故事。这一点与其他农村地区的农民与牛之间的情感联结存在共通之处。

2.2.3 身份转型策略: 生命形式的更迭

耕牛不仅在生前嵌入村民日常生活的不同面向, 死后也未脱嵌。村民将亡牛的头骨捡回家, 刻画上经文, 放到村口转经塔处的玛尼堆上, 以超度亡牛的灵魂。与佤族将剽牛得来的牛头骨数量视为财富的象征^[21]不同, 夏乌村村民从来不会宰杀耕牛。有些村民甚至将牛头骨挂在家中墙上, 并献上哈达。这既是对家空间的装饰, 也是对牛的记忆。可见, 耕牛在去世之后, 并未消失, 而是以另外的形式继续建构着村民的日常生活。

耕牛作为畜力的核心功能被机械所替代, 但村民并非通过创造新的功能合理化其持续存在, 而是选择放生。在夏乌村, 放生牛可以选择正式或非正式两种形式。正式放生指村民专门向寺庙求来“寿线”, 穿在牛耳上, 以示牛的放生身份。这条“寿线”既是神圣符号, 也是承诺——禁止任何人宰杀食用, 直至牛自然寿终。非正式放生则直接将牛放养至村庄的后山上, 任其自由生活。被放生后的牛拥有神圣身份。村民感念耕牛曾经为家庭的付出和牺牲, 当不再需要牛辅助农耕时, 则将其余生还于大自然。这一点与很多农村地区大为不同。如, 有些农村地区当不再需要牛耕地时,

则赋予其经济价值——靠出售牛崽维系村民养牛的动力,最终改变了牛的雌雄比例^[22]。夏乌村村民不是通过不断为牛制造新的功能来维系人与牛的关系,而是依据牛的生命使命变化,顺其自然地调适人与牛的关系形式。

综上,青稞与耕牛从物质、社会与精神等多面向嵌入村民日常生活,塑造了具有鲜明地方特性的社会文化。在这一过程中,青稞与耕牛是村民的无机身体,帮助村民建立与自身、他人、社会以及村民与时间、地方之间天然的有机联系,这是人的自然化过程^[23]。此时,自然是作为工具的自然,是人的表征,其功能在于当人类行动者缺场或能力受限时,为日常生活叙事和代言。本文将此类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界定为表征型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强调自然与人之间表征与被表征关系。

3 自然的人化实践:村民建构虫草与猕猴的生命意义

3.1 村民与虫草

3.1.1 意义强化策略:计量单位的选择

虫草是寄生于昆虫、少数真菌和植物体上的一类真菌^[24],只能生长在海拔 3 000~5 000 m 的高山草原上。历史时期主要因其药用价值为人所知,用于医学领域。然而,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虫草进入礼物经济领域,成为赠送亲朋或领导的奢侈品,其符号象征意义超过药用价值,并在民间有了“软黄金”的称号。消费市场对虫草的迷恋,使消费者与远方的生产者之间建立起联系。虫草被赋予了重要的经济价值,而挖虫草成为当地居民主要的经济收入来源。夏乌村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既已开始卷入到虫草经济的交易链条之中。

村民以“根数”作为计算虫草收入与产量的单位。据村民反映,往年每根虫草的价格可卖至数十元至百元不等,均价每根 40~50 元,但 2020 年调研时,虫草价格每根降至 20 多元。此外,村民之间也是以根数为计量单位,交流当天或当年的虫草收获情况。相较于,以重量作为计量单位,这种以根数计量的形式更加强化了虫草资源的稀缺性及其高经济价值。

村民以“虫草收入”作为估量家庭经济收入的重要参照尺度。研究者在入户调查家庭收入情况时发现,村民无一例外的首先报出虫草收入情况,只有当继续追问时才会补充告知其他收入来源。

根据入户调查统计,夏乌村村民依赖虫草可实现年均家庭收入约 0.8~1.3 万元,是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这种过度单一的经济收入结构强化了村民对虫草经济价值的认知,同时也使家庭经济稳定性过度依赖礼物经济市场,将导致其脆弱性变得更强。

3.1.2 制度化策略:乡规民约的形成

夏乌村约定一套“挖三休二”的时间制度,旨在实现村民间公平正义。虫草无法人工种植,天然生长的虫草本质上属于公共资源。然而,每年采挖时间集中且有限,夏乌村的采挖时间从 4 月中下旬至 6 月上旬,最长持续 50 d 左右。为了相对公平的配置公共资源,避免因资源争夺引发冲突,政府规定必须持证采挖。此外,村民在长期实践中,自发形成了一套“挖三休二”的时间制度。所谓“挖三休二”即全村村民约定连续挖 3 d 虫草后,接着集体休息 2 d,以确保所有村民保持相同的生计节奏。每年由几位村长协商确定开挖虫草的具体日期,再借助微信群和小组组长通知每家每户,全村统一行动。G2 提到“村民可在这 2 d 时间内休息、处理家庭事务,也可以将挖回来的新鲜虫草带至县城及时售出。”如此一来,尽可能减少因采挖时间差异造成每家虫草收获量不均衡。村民休整的同时,虫草以及被翻动的土壤等也得以恢复、新生,获得喘息之机。

夏乌村形成一套“轮流守山”的边界制度,旨在实现集体利益最大化。如上所述,虫草资源具有公共性,经济价值又高,容易出现越界盗挖的情况。20 世纪 90 年代,夏乌村和邻村就因争夺山域虫草采挖权而发生冲突。此后,为了防止邻村越界采挖,夏乌村自发组织驻山巡逻队看守边界山域。全村共设 12 个村民管理小组,每组 7 户,每年派一组驻山巡逻,12 个小组依次轮流。负责驻守巡逻的小组整个虫草季都住在山上,成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负责阻止其他村的村民盗挖。G3 透露守山制度确实减少了因越界盗挖引起的村际冲突。出于公平与凝聚等因素考量,每年负责驻山巡逻的这组村民将采挖的虫草集中售卖,所得收入均分。通过建立边界,形成领地意识,尽可能维护集体资产的排他性。

3.2 村民与猕猴

3.2.1 空间协商策略:道德边界的延伸

村民通过休耕青稞田以及投喂食物,应对猕

猴的空间侵扰。近年来, 村民与猕猴之间存在季节性冲突。每到春冬季节, 山上食物匮乏, 猕猴成群下山, 侵入村民的青稞地、院落或 317 国道边寻找食物。G4 提到“木巴的猴子很肥, 直接跑到村委会问他们要食物吃, 村委会的人都习惯了。”除了吓唬、驱赶之外, 村民以不伤害猕猴为原则, 不得不休耕山脚下经常被猕猴损坏严重的青稞田, 用于长畜草。村民主动让渡空间, 避免人与猕猴之间的直接冲突。此外, 当村民遇见猕猴时, 常会主动拿自家粮食或食物喂给, 期间也不乏被咬伤的突发情况。R11 即在受访前几天因喂猴子而被咬伤。即便如此, 村民也未终止帮助猕猴的行动, 依然将猕猴纳入自己的道德关怀范围之内。

村民试图将责任主体的范围扩大至道路空间中的其他使用者。近年来, 不法分子盗抢、司机撞死/伤猕猴等行为常有发生。村民常借助公共舆论表达对上述行为的不认同。当然, 司机或自驾游者主动喂猴子的友善行为也会受到村民的赞扬和肯定。除此之外, 如若村民恰好遇见事故发生, 则亲自要求责任人妥善安置猕猴。R12 反映曾遇见过路面包车司机撞死猕猴后逃逸, 自己则骑摩托车追赶, 要求司机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安葬猕猴。可见, 夏乌村村民不但拓展道德关怀客体的边界, 而且意欲扩展道德关怀的主体范围。

3.2.2 制度化策略: 经济理性的迎合

村民通过景观化策略, 将猕猴塑造为游客凝视的对象。近年来, 317 国道旅游逐渐兴起, 自驾车辆趋多, 而自驾者对路况不熟, 车撞猴事件时有发生。为此, 夏乌村驻村工作队与江达县旅游局、人社局合力在猕猴经常出没的 317 国道边, 建立夏乌村野生猕猴保护站。保护站设有醒目的标识牌, 向自驾者售卖零食, 鼓励人猴互动。猕猴保护站正是充分利用了自驾游者对新异事物的好奇心理, 旨在引起道路使用者注意。无论猕猴是否真的在场, 都能丰富旅游者的旅游体验, 提高他们对猕猴的关注度, 从而能够避免因“未知”和“无视”造成肇事伤害。夏乌村利用了现代人的景观消费心理, 将猕猴从“后台”搬至“前台”, 使其从一种隐性存在逐渐被对象化和显性化。

村民通过程式化策略, 将监管猕猴的工作规范下来。猕猴保护站主要是防范猕猴聚集在马路中央, 及时引导、疏散猕猴至安全地域, 避免交通安全隐患。为此, 夏乌村制定了具体的工作规范

和人员分工。保护站的日常运营工作由村长部署, 全村 12 个村民小组轮流执勤, 每组执勤 10 d, 每天派出 3 户, 每户至少 1 人, 轮班顺序根据抽签确定。每天值守人员负责拍摄照片或录制视频, 分享至村领导小组的微信群。这种程式化的工作制度提高了村民的责任感和积极性。除此之外, 售卖零食所得收益除了预留一部分继续用于保护和救助猕猴外, 剩余部分作为年底分红用以激励村民。这种程式化的工作制度将零散的个体行为转化为制度性的集体行为, 能够引起村民对保护猕猴的重视。

综上, 村民借助系列生活实践策略建构着虫草和猕猴的生命意义, 赋予其符合当下意识形态的新功能与价值。原本未经人类干扰的纯粹自然被社会化了, 并被不同程度地卷入到现代性之中。在这一过程中, 人的实践延伸了“物”的社会生命, 这是自然的人化过程^[25]。此时, 自然是被实践的对象, 被日常生活所建构, 人是其实现社会化的工具, 并赋予其社会生命。本文将此类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界定为链接型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强调人对自然的社会生命延伸。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尝试总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构建路径, 如图 2 所示。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夏乌村的案例呈现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两条构建路径。一是, 通过人的自然化实践, 建构起表征型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此时, 自然是人的身体延伸, 属于工具化的自然, 自然与人的关系是表征与被表征关系。具体来看, 藏族居民与青稞、耕牛互动时, 借助物质性、情感性、空间性以及身份转型等多重生活实践策略与后者建立联结。在这一过程中, 自然的功能在于当人类行动者缺场时, 可以为日常生活叙事和代言, 实现跨时空、向他者表达和传递意义。村民在这一过程中实践着人的自然化, 扬弃了人的异化, 始终与自然、他人、自身保持着天然的有机联系。二是, 通过自然的人化实践, 建构起链接型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此时, 自然是人的实践对象, 属于对象化的自然,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建构与被建构的关系。具体来看, 藏族居民与虫草、猕猴互动时, 借助意义强化、地方性制度、空间协商等生活实践策略与后者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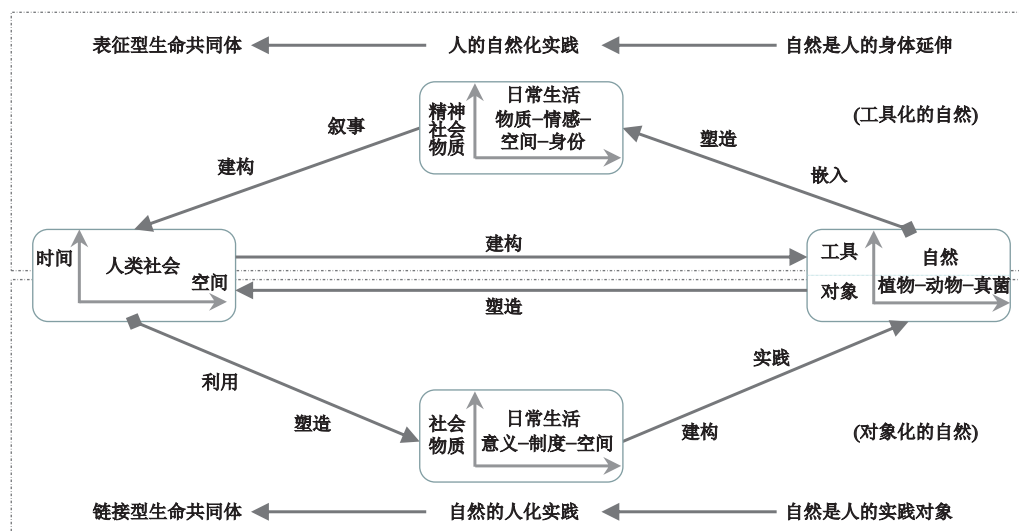


图2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构建路径

Fig.2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the community of life for man and nature

立联系。在这一过程中,人类行动者利用现代人的理性逻辑,赋予自然以社会生命,是自然实现社会化的工具,自然在日常生活中被社会所建构,实现了自然的人化,得以“名正言顺”地存续于人类社会之中。

4.2 讨论

在具体的地方情境中,地方社会与自然事物是双向互构关系。本地居民赋予自然物意义的同时,地方的社会文化也将不可避免地被自然物所建构。以夏乌村的虫草为例,虫草被社会化、商品化的同时,也重构了地方社会的时间结构、空间结构、经济结构与社会关系结构。这就意味着,在人与自然关系中,并非只是人类单向地亲近^[26]或征服、管治^[27]自然,自然也会反过来规训人类行动者行为,塑造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

人与自然的关系样态受地方文化的影响,具有鲜明的地方性。夏乌村人不是以己为中心来循环建构人与自然关系,而是在充分尊重自然生命的基础上,动态地发展人与自然关系。这与藏族人自成体系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密切相关。本质上,是一种关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藏族人基于关系中心主义建立起的人地联结更具韧性和可持续性,一定程度上能够抵御现代性所带来的异化。

归根结底,人与自然能否和谐共生有赖于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社会生态学家默里·布克金曾指出,生态环境危机源自于人类社会的等级制,是人对人的支配和统治最终导致了人对自然的支

配和统治^[28]。当自然被商品化,很可能衍生出地理发展不平衡问题^[29]。但是,在夏乌村的案例也可以看到,来自地方政府与社区内部的系列制度,一定程度上可以抵制不均衡现象的发生。尤其是社区自发形成的互惠互助制度,消解着每个家庭因先赋性的不公平因素可能带来的结果不公平,力求社区内部家户之间实现最大程度的均衡。夏乌村之所以能够产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局面,或许与其“共产”制度不无关联,但两者之间具体存在怎样的联系尚且有待另作他文进行阐述。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王琪.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科学内涵与建构路径[J].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42(2): 96-102. [Wang Qi.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and constructional pathway of the concept of "Man and Nature Are the Community of Life". Journal of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20, 42(2): 96-102.]
- [2] 韩志伟, 陈治科. 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内在逻辑: 从外在共存到和谐共生[J]. 理论探讨, 2022(1): 94-100. [Han Zhiwei, Chen Zhike. On the inner logic of the community of human and natural life: From external coexistence to harmonious coexistence.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 2022(1): 94-100.]
- [3] 孙要良. 唯物史观视野下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解读[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9(4): 85-91. [Sun Yaoliang. Interpretation of Xi Jinping's concept of 'Man and Nature Are the Community of Lif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ontemporary World and Socialism, 2019(4): 85-91.]
- [4] 陆雪飞, 吴岩.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理论基础及实践

- 路径[J]. *广西社会科学*, 2019(11): 90-95. [Lu Xuefei, Wu Yan.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path of the concept of 'Man and Nature Are the Community of Life'. *Guangxi Social Sciences*, 2019(11): 90-95.]
- [5] 吴传钧. 论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人地关系地域系统[J]. *经济地理*, 1991, 11(3): 1-6. [Wu Chuanjun. The core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Man land system. *Economic Geography*, 1991, 11(3): 1-6.]
- [6] Tadaki M, Salmond J, Le Heron R et al. Nature, culture, and the work of physical geography[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012, 37(4): 547-562.
- [7] 朱竑, 尹铎. 自然的社会建构: 西方人文地理学对自然的再认识[J]. *地理科学*, 2017, 37(11): 1609-1616. [Zhu Hong, Yin Duo. Social construction of nature: The rethink of western Human Geography on natur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37(11): 1609-1616.]
- [8] Proctor J 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nature: Relativist accusations, pragmatist and critical realist responses[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98, 88(3): 352-376.
- [9] Woodgate G, Redclift M. From a 'sociology of nature' to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Beyond social construction[J]. *Environmental Values*, 1998, 7(1): 3-24.
- [10] Longhurst R. Plots, plants and paradoxes: Contemporary domestic gardens in Aotearoa/New Zealand[J].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2006, 7(4): 581-593.
- [11] Shillington L. Being (s) in relation at home: Socio-natures of patio 'gardens' in Managua, Nicaragua[J].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2008, 9(7): 755-776.
- [12] 李华, 叶敬忠. 被捕获的自然: 重申水资源商品化[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31(2): 40-47. [Li Hua, Ye Jingzhong. Captured nature: Rethinking water commodification.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4, 31(2): 40-47.]
- [13] 尹铎, 高权, 朱竑. 广州鳄鱼公园野生动物旅游中的生命权力运作[J]. *地理学报*, 2017, 72(10): 1872-1885. [Yin Duo, Gao Quan, Zhu Hong. The excise of biopower in wildlife tourism: A case study of Crocodile Park, Guangzhou.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72(10): 1872-1885.]
- [14] 尹铎, 高权, 卢薇, 等. 超越人类的地理学视角下丽江古城旅游地的营建与消费[J]. *旅游学刊*, 2021, 36(4): 96-105. [Yin Duo, Gao Quan, Lu Wei et al. Place constr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Lijiang ancient tow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re-than-human geographies. *Tourism Tribune*, 2021, 36(4): 96-105.]
- [15] Yeh E T, Lama K T. Following the caterpillar fungus: Nature, commodity chains, and the place of Tibet in China's uneven geographies[J].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2013, 14(3): 318-340.
- [16] 李安君. 生命共同体: 人与自然如何共生的实践之解[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41(4): 146-153. [Li Jun'an. Life community: a practical solution to the symbiosis of man and nature. *Journal of Jisho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20, 41(4): 146-153.]
- [17] 吴海龙, 韩璞庚. 生命共同体: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现实维度[J]. *东岳论丛*, 2018(10): 102-107. [Wu Hailong, Han Puge. Community of life: The realistic dimension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Dongyue Tribune*, 2018(10): 102-107.]
- [18] A·施密特. 马克思的自然概念[M]. 吴仲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8. [Schmidt Alfred. The conception of nature in Marx. Translated by Wu Zhongfa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8.]
- [19] 刘美新, 蔡晓梅. 跨国精英移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与根植性家的营造[J]. *人文地理*, 2021, 36(6): 60-66. [Liu Meixin, Cai Xiaomei. The everyday life practice and home-making of transnational elite migrant. *Human Geography*, 2021, 36(6): 60-66.]
- [20] 罗秋洪, 杨筑慧. 日常生活视域下的耕牛养殖与村落文化——基于云南C村的调查[J]. *广西民族研究*, 2021(5): 122-129. [Luo QiuHong, Yang Zhuhui. Cattle breeding and village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aily life: A case study on C Village in Yunnan. *Guangxi Ethnic Studies*, 2021(5): 122-129.]
- [21] 杨筑慧. 牛: 一个研究西南民族社会文化的视角[J]. *广西民族研究*, 2014(4): 122-132. [Yang Zhuhui. Cow: An angle to study social culture of minorities in southwest China. *Guangxi Ethnic Studies*, 2014(4): 122-132.]
- [22] 马翀炜, 孙东波. 遭遇理性的牛——关于红河哈尼梯田景观遗产的思考[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9, 40(11): 33-41. [Ma Chongwei, Sun Dongbo. The cattle encountering with reason—Reflections on the landscape heritage of Honghe Hani Terraced Fields. *Journal of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2019, 40(11): 33-41.]
- [23] 王伟. “人的自然化”概念的内涵及其实现路径[J]. *教学与研究*, 2020(7): 65-73. [Wang Wei. The conception of naturalization of human and its ways to implementation. *Teaching and Research*, 2020(7): 65-73.]
- [24] 董彩虹, 李文佳, 李增智, 等. 我国虫草产业发展现状、问题及展望——虫草产业发展金湖宣言[J]. *菌物学报*, 2016, 35(1): 1-15. [Dong Caihong, Li Wenjia, Li Zengzhi et al. Cordyceps industry in China: current status, challenges and perspectives—Jinhu declaration for cordyceps industry development. *Mycosystema*, 2016, 35(1): 1-15.]
- [25] 徐碧辉. 从“自然的人化”到“人自然化”——后工业时代美的本质的哲学内涵[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38(4): 64-70. [Xu Bihui. From 'Humanization of Nature' to 'Naturalization of Man'—The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 of the essence of beauty in the Post Industrial Era. *Journal of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1, 38(4): 64-70.]
- [26] Cater C. Any closer and you'd be lunch! Interspecies interactions as nature tourism at marine aquaria[J]. *Journal of Ecotourism*, 2010, 9(02): 133-148.
- [27] Akama J S, Maingi S, Camargo B A. Wildlife conservation, safari tourism and the role of tourism certification in Kenya: A

- postcolonial critique[J]. *Tourism Recreation Research*, 2011, 36(3): 281-291.
- [28] 默里·布克金. 自由生态学: 等级制的出现与消解[M]. 邹庆治译.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8. [Murray Buchkin. The ecology of freedom: The emergence and dissolution of hierarchy. Translated by Huan Qingzhi. Jinan: Shangdo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 [29] Smith N, Harvey D. Uneven development: Nature, capital,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Georgi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8.

Build the Community of Life for Man and Nature Based on Life Practice: A Case Study of Xiawu Village in Tibet

Sun Jiuxia¹, Wang Yuning¹, Pang Zhaoling²

(1.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Guangdong, China; 2. Ningbo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Angers Joint Institute at Ningbo,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01,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is a central topic of geography, and a major problem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In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Xi Jinping clearly put forward the important thesis of ‘Human and Natural Life Community’. How to implement the public policy discourse into the concrete action practice depends on scholars’ empirical analysis on typical cases. The previous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usually take individual or family as the analysis unit, discuss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individual or family and the specific type of natural object. Relatively little works have been done dissecting ho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in specific regions are constructed. Taking Xiawu Village in Tibet as a case study, field investigations were carried out for villagers and government workers based on qualitative methods such as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society and nature, and analyzes how to construct the community of life for human and n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aily life practice.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When Tibetan villagers interact with highland barley (*Hordeum vulgare* var. *coeleste*) and cattle, they connect with the latter through multiple life practice strategies, such as material, emotion, space and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man’s naturalization, a representational community of life for human and nature is constructed. At this time, highland barley and cattle, as instrumental nature, are the physic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villagers, narrating the daily life when human actors are absent. 2) When Tibetan villagers interact with Cordyceps and Macaca, they connect with the latter by means of life practice strategies such as meaning, system, and space negotiation.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humanization of nature, a linked community of life for human and nature is constructed. At this time, Cordyceps and Macaques, as objectified nature, were constructed by society, given social life, and gradually embedded in human’s daily life.

Key words: community of life for man and natur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life practice; traditional Tibetan village